

陈月茹 刘 欣 著

中外中小学教科书 制度比较研究



山东友谊出版社

陈月茹 刘 欣 著

中外中小学教科书 制度比较研究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中小学教科书制度比较研究/陈月茹,刘欣著.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2009.7

ISBN 978-7-80737-578-4

I. 中… II. ①陈… ②刘… III. 教材—制度—对比研究—中国、外国
IV. G4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9371 号

主 管: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电 话:总编室(0531)82098756 82098142
发行部(0531)82098035(传真)
印 刷:潍坊彩源国标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170mm×230mm
印 张:12.75
字 数:220 千
定 价:30.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前 言

在学校教育中,教科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作为达成教育目标的主要工具,从宏观上看,教科书肩负着传递社会价值的重任;从微观上看,高质量的教科书和学习材料可以为课堂教学提供基本框架,帮助教师制定教学计划,完成教育教学任务。

随着国家公共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作为其有机组成部分,中小学教科书管理制度不断得到发展与完善。为了确保公民拥有平等的享受基础教育的机会,确保教育内容的公正性和正确性,确保国民基础教育质量,各国政府历来都十分重视中小学教科书管理制度的建设与发展。

教科书制度的优劣、成效大小受诸多因素影响。一方面,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又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连;同时,出版业的规模、战略重点等,也对其产生重要制约作用。

如今,经济、教育的全球化浪潮对教科书品质提出了诸多新要求,如教育公平、文化多元、与时俱进、贴近学生需求及特点、培养创新精神等,对教科书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

近年来,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编审权的逐步开放,营造了百花齐放的宽松环境,取得令人欣喜的变化和进展。然而,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教科书质量及市场运作的规范性,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各色新版教材及其使用过程中采集到的反馈信息可以看出:一方面,编审队伍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导致的教科书编制质量下降的现象较为普遍;另一方面,由于教科书审定、选用制度的不完善、不合理,造成出版行业出现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了广大中小学生的利益,也加剧了教科书出版业的混乱局面。因此,借鉴国外教育发达国家教科书管理制度的成功经验,结合国情、民情,尽快建立完善、完备、合理的中小学教科书管理制度,是纠正、扭转当前教科书出版鱼龙混杂现象的必要和急迫之举。

教科书制度主要包括五方面的内容,即教科书编制、教科书审定、教科书出版发行、教科书评价、教科书选用。本书围绕这五个主题展开广泛深入的国际比较,在比较的基础上分析各种政策、做法的利弊,提出改革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制度的意见和建议。对不同国家教科书管理制度的研究,不仅介绍他们当前的政策、做法,分析某种政策被采纳的政治、文化、经济缘由,还以历史的眼光阐述其存在、发展变化的必然性、合理性以及与时俱进的必要性。这种开阔、深入的研究视野,将为制定、完善我国教科书管理制度提供有力的佐证和参照。

在教科书管理制度研究领域,英、美、日、德等国家一直非常重视以比较的观点审视问题,不少专业研究机构均把国际比较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如 Georg Eckert Association、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on Textbooks and Educational Media 等。相对而言,国内此领域研究的系统性、全面性、深刻性明显逊色,很少有专门的组织机构和专业人员从这种视角切入,成果多散见于报刊、杂志,相关专著处于空缺状态。

从总体上看,国内外已有成果普遍存在着如下缺陷:对教科书管理制度一般性介绍多,结合各国文化、历史背景深入阐释、解读者少;比较视野多限于 2~3 国,以世界教育发展史广阔视野生发、评鉴者少。这类成果固然可以帮助人们窥见他国教科书管理的基本制度,但却不利于帮助决策者宏观了解并理解各种教科书管理模式类型、运作方式的特色、优势和局限性,不足以制定、完善国家和各地区教科书管理制度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

本书力图打破仅重国别、重现行制度介绍的流弊,从制度中的问题切入,既对教育发达国家的教科书制度作全景描述,同时横向比较各国的不同政策、措施,而后对世界中小学教科书管理制度的渊源、变迁、现状及发展趋向作出较为整体、系统的勾勒,联系中国教育改革现实,为有中国特色的中小学教科书管理制度的建立、发展,提出操作性的建议和实施方略。由此,不仅在研究视角上有所突破,而且有望填补国内该领域系统研究的空白。

本书是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青年专项课题《中外中小学教科书制度比较研究》(课题编号 EDA050195)的主体成果,由陈月茹、刘欣合作完成。

本书写作过程中参考、引用了国内外大量文献资料,谨向原作者表示衷心感谢。因能力及条件所限,书中如有缺点和错误,请读者批评指正。

陈月茹
2009 年 6 月于山东师范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缘起	(1)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4)
第三节 研究目的、框架与方法	(13)
第二章 教科书制度比较研究的理论基础	(15)
第一节 制度的内涵	(15)
第二节 教科书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的价值	(20)
第三节 教科书制度比较研究的理论原点和价值诉求	(25)
第三章 中国中小学教科书制度	(32)
第一节 中国内地中小学教科书制度	(32)
第二节 香港中小学教科书制度	(42)
第三节 台湾地区教科书制度	(53)
第四节 澳门教科书制度	(64)
第四章 分权型中小学教科书制度运行效能国别研究	(75)
第一节 英国教科书制度	(75)
第二节 美国教科书制度	(80)
第三节 法国教科书制度	(85)
第四节 日本教科书制度	(90)
第五节 德国教科书制度	(101)

第六节	加拿大教科书制度——以安大略省为例	(109)
第七节	澳大利亚教科书制度	(113)
第五章	集权型中小学教科书制度运行效能国别研究	(119)
第一节	俄罗斯教科书制度	(119)
第二节	巴基斯坦教科书制度	(130)
第三节	韩国教科书制度	(136)
第四节	泰国教科书制度	(142)
第五节	马来西亚教科书制度	(148)
第六节	新加坡教科书制度	(152)
第六章	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出版发行制度比较研究	(159)
第一节	教科书编审制度比较	(159)
第二节	教科书出版、供给制度比较	(164)
第七章	中小学教科书评价、选用制度比较研究	(170)
第一节	教科书评价制度比较	(170)
第二节	教科书选用制度比较	(173)
第八章	完善中国内地教科书制度体系的思考与建议	(179)
第一节	对中国内地现行中小学教科书制度的思考	(179)
第二节	完善中国内地教科书制度的若干建议	(184)
参考文献		(188)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教育制度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整个社会的变化发展而不断地变化发展,二者相互影响,关系密切。从意识形态方面看,教育常为社会变迁的动因(agent);就经济角度而言,教育常为社会变迁的条件(condition);至于技术方面,教育常为社会变迁的结果(effect)。^① 教科书制度也是如此。一方面,教科书质量的高低,会对教育质量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到社会生产力水平提升的进程;另一方面,社会各项保障、监督制度的创立、完善状况,又会决定教科书质量改进的速度、水平。

第八次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所倡导的理念,在经历了期待、吸收、质疑、困惑、抵制、坚持等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过程后,已成为当下学校中的“行为方式”。但在教科书领域,却正上演着波涛汹涌、风诡云谲的活剧。一方面,国家连续出台了多项包括限定价格的教科书管理新政,力图规范出版市场,给使用主体以实惠;另一方面,教科书出版发行成了孕育腐败的温床,家长、教师抱怨教科书出版急功近利,粗制滥造。与此同时,纸价飞涨,原来把中小学教科书当作美味奶酪的出版社,在长远的利益驱动和残酷的竞争现实之间进退维谷……

国家从2006年秋季开始对中小学(高校)教科书实行严格的限价政策,标准依据当时的市场纸张价格制定。其后,纸张价格与其他商品价格一样持续攀高,

^① 杨子秋:《探析澳门特区非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J],行政,2006(02)。

业内人士甚至用“疯涨”来形容。有多疯狂？在一篇题为《纸荒：考验中国出版业》^①的文章中，作者指出，纸张价格从2007年7月初即开始浮动，到2008年1月，基本上是一个半月一个价格。文章中的统计数据显示：“作为中小学教材主要用纸的70克胶版纸和80克胶版纸价格已经上涨14%；轻型纸和铜版纸售价一吨上涨了1000元，如轻型纸，已从6200元涨至7200元，涨幅在10%到12%；元旦过后仅仅5天时间，铜版纸已经在2007年年底报价的基础上，每吨又上调了200到300元。”作者援引了老出版人、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吴星飞的观点：“这次纸张涨价是30年来少有的。”然而，在这篇文章发表仅两个月后，“这个记录已经被刷新”、“年前是一月一涨，年后是一月两涨”。^②

如果说出版社叫苦不迭还属于“甘苦自知”，只是业内关注的焦点，那么，由此引发的教科书内容质量问题却是全社会的众矢之的。2004年9月，由教育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编审委员会审定的新版高中政治教材《思想政治1：经济生活》，在开展高中课程改革的广东、山东、宁夏、海南等四省区的112万高中生中启用。这本区区118页的教科书，却被一位中学政治特级教师指出了数十处出硬伤和“内伤”，“甚至一页内就出现好几处错误”。该老师将这些错误归纳整理为：排版印刷错误、词语使用不当、标点符号不妥、句子语法错误、概念混为一谈、定义不够准确、前后自相矛盾、脱离生活实际、基本观点错误、表述含糊不清等等。^③

相关人士推测，出现这些低级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时间太过仓促。2004年3月，教育部公布新的课程标准，6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拿出教材样本到北京参加教材竞标会，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初审通过后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9月即投入使用，全部过程不足半年。与此形成鲜明比照的是，日本一本新教科书从编辑、出版到发至学生手中，大约需要四年时间，^④单是编写和审定就需要整整两年时间。可见，教科书质量问题不能简单归咎于出版社的急功重利，它首先是某些制度的必然产物。

教科书是一个拥有众多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港台地区常译作持分者）的领域，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新闻出版署、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出版商、发行代理商、工商部门、税务部门……如此庞杂的群体，其关系如何协调？如何做到利益制衡？唯有依靠有效的制度。

^① 陈香：《纸荒 考验中国出版业》[N]，中华读书报，2008-01-15。

^② 陈香：《教材出版：刀锋上的舞蹈？》[N]，中华读书报，2008-03-26。

^③ 周敏：《政治课本几十处错 山东等四省区高中生正在用》[N]，齐鲁晚报，2004-10-20。

^④ 唐磊：《走近日本教科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11页。

在我国,教科书制度问题长期未纳入课程与教学理论的研究范畴,这是长期实施高度教育集权制的必然结果。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教科书的编写、审查、出版、供给,均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其运行模式是所谓的“运动员、裁判员二位一体”,包括教育研究者在内的社会各界对其少有问津。20世纪90年代初,基础教育课程管理权逐步下放,越来越多的出版发行部门介入教科书业务,国家建立了若干相应的教科书管理制度来规范教科书市场。在随后的课程改革中,又陆续出台了若干新制度。这些措施均取得一定成效,但并未触及根本性问题。

时代在飞速变迁,教育事业发展日新月异,要使教科书质量得到持续保障,要使教科书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弊端得到妥善、及时的解决,教科书制度必须不断创新。

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制度变革有更多的良好预期,由此激发了制度创新的动力,以克服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不过,制度变迁与创新的发生不是单一动力作用的结果,它总体上体现出社会、国家与制度之间的交相互动的持续动力机制。制度改革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它所涉及到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区域和部门不可能彼此孤立、各自为政,而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即是说,教科书制度创新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否则,就可能在解决一个老问题的同时,带来一个甚至多个新问题。

在完善教科书制度、规范教科书市场方面,若干国家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特别是一些教育发达国家,其国力崛起在先,市场经济体制成熟在先,教育体制完善在先,它们对于教科书制度的制定及监督实施,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可资我们借鉴。

但制度本身与历史、政治、文化、经济密不可分,往往表面看来趋近的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却大相径庭。如果仅仅采撷的是零碎的条文规定,往往会带来水土不服,教科书制度自然也是如此。因此,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科书制度,不仅需要考察其社会发展历史,同时要将其放到世界背景下加以剖析,理解制度的源起、生存环境、运行状况以及预后反应。

由此,本研究以教科书制度的中外比较为对象,在立体化呈现多国教科书制度运行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各国国情、史情,分析各自的特色及利弊,力图为完善我国教科书管理体制尽绵薄之力。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世界教科书制度研究流派分析

(一)从批判社会学的角度对教科书制度进行分析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和英国教育社会学家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认为,课程是一种“文化资本”。课程是如何成为主流文化代言人的呢?批判学家认为,这可以从教材出版决策过程、外部市场的发行过程、教材的编写与审查,以及教师对教材的选择上得到说明。

基于这一视角的研究者认为,“关于教科书中涉及的包括编写和编辑等众多的论题在内的内容,他们是否完全被复杂的市场关系所控制,是否完全为围绕教科书出版所制定的国家政策所控制,哪些是教科书运作中产生出的自相矛盾的力量,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探讨^①。”他们通过分析教科书出版的内部决策过程和外部市场的发行过程,分析教科书及其他教学材料如何体现某些大众文化或精英文化。

这些研究所提出的问题虽然未能完全得到解决,却为如何更为科学、公平地建立教科书制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略。

(二)以经济再生产理论为基础对教科书制度进行分析

教科书既是文化作品,又是商业产品。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首的国际组织以及各国研究机构,以经济再生产理论为基础,对亚洲、非洲、大洋洲、南美洲等国家的教科书制度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涉及教科书的出版、审定、选用、发行、使用等方面,对影响教科书制度实行的因素、教科书制度运行的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

研究发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教科书供应水平在整个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不断下降,到90年代仍未达到平均每名学生一本教科书的水平。政府为主导的教科书供应,既不经济又效率低下。教科书制度的实施,受匮乏的资金、相互冲突的政策、没有保障的发行途径、缺乏接受训练的人员等因素影响,很多国家的教科书供应依然依靠周期性的外部资助,而且到目前为止尚未建立教科书出版、发行等所需的基础设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教科书制度发展变化的明显趋势,就是教科书选用过程变得更加分权,经济自由化使得越来

^① M. 阿普尔:《教科书的文化及商品属性》[A],M. 阿普尔、L. 克丽斯蒂安·史密斯主编:《教科书政治学》[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序言。

越多的商业出版商开始出版教科书,更加注重建立可持续的教科书制度。^①

这些研究的局限在于,研究的发起者和研究者都是经济发达国家的组织和人员,他们受到的是经济发达国家的教育和训练,对教科书概念、教科书制度效率等的判断,遵循的都是经济发达国家的标准,提出的建议是构建基于经济发达国家学生发展的促进模式,缺乏普遍意义。而各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存在诸多差异,教科书制度的建立标准应该是多维的。

(三)将教科书制度视为社会亚系统进行研究

一些研究试图发现书籍出版与其他社会因素之间的联系,例如,Shigeo Mineowa 运用经济理论,研究了德国、法国、日本、英国、美国的出版业与科学、经济、技术、市场、阅读环境的关系,试图发现其共同点,结果却表明它们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Mineowa 的研究有两大局限:一是只分析了社会因素对教科书出版数量的影响,忽视了对教科书质量的影响。二是忽视了教科书产品有别于其他产品的运行特点。当教科书出版进入工业化后,教科书制度就成为社会亚系统,虽然要受到其他系统的影响,但可以相对独立地运行、发展。^②

目前,相当多的研究者将教科书制度作为社会亚系统进行研究。通常,研究将其划分为若干环节,即把教科书制度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进行对比分析,并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对建立或改进本国的教科书制度提出建议。例如,日本教科书研究中心研究员细野二郎对 23 个国家中小学生的教科书批准和采用制度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将其归纳为国定制、审定制、选定制、认可制和自由制五大类^③; Pernille Askerud 将教科书制度划分为市场型、政府主导型和混合型^④。

这类研究的困难在于需要得到大量的资料,而且这种原子式的研究容易割裂教科书制度与其他社会制度之间的联系。这类成果固然可以帮助人们窥见他国教科书管理的基本制度,但却不利于帮助决策者理解各种管理模式背后的深层次意义。

(四)将教科书制度的建立、发展与教育制度相联系

教育制度与教科书制度联系最为紧密。一系列研究试图发现教育制度的类

^① Montagnes, Ian (2000): *Textbook and Learning Materials, 1990-1999, Thematic Studies for World Education Forum, Education for All Assessment*. UNESCO, Paris.

^② Mineowa, Shigeo (1995), “Societal context of book publishing” in Altbach, Phillip and Hoshino, Edith, (edit.) International Book Publishing, An Encyclopedia. Fitzroy and Dearborn Publishers, London and Chicago.

^③ 北师大课程教材研究小组:《国外中小学教科书制度简介》[J]. 教育学报,1991(03)。

^④ A Frame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olicies For The Provis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Schools and Non-Formal Education Programmes. UNESCO, Paris.

型、发展与教科书制度的类型、发展之间的联系。例如：教科书制度与课程制度间联系^①、有关教科书概念的发展变化与教科书制度发展变化的关系等。^②这些研究提醒我们，教育制度的变革必然与教科书制度的变革相联系，却容易忽视教科书制度建设所必需的其他相关条件。

（五）国外教科书制度比较研究的类型

国外教科书制度比较研究主要偏重于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用教科书制度运行的实际结果来分析教科书制度本身及其支持系统存在的问题，并对进一步完善教科书制度提出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的调查通常从这个角度进行。例如《教科书与学习材料 1990～1999》(Textbook and Learning Materials, 1990～1999)^③一文，在调查了全部非洲国家、大部分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后指出：集权式教科书制度效率低下，而且由于资金匮乏、制度管理相互矛盾、教科书发行设施欠缺、管理人员不足等原因，很多国家的教科书供应体系仍然没有建立起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有竞争力的教科书供应系统，需要教科书企业按照经济规律运行。

第二种类型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探讨教科书制度。美国学者有关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研究通常从此角度进行。研究者认为，为了通过审定，教科书的内容通常很全面，尽量包容一切，但对问题的探讨通常不够深入。例如，《疯狂的教科书选用》^④(The Mad, Mad World of Textbook Adoption)一文指出：由于受各种集团的压力影响，教科书的选择不是根据它们的风格、内容有效性进行，而是根据选用指导方针进行。

二、国内研究概览

综合分析国内关于教科书制度的比较研究，可按内容大体分为描述、评价、解释三种倾向。研究者希望揭示教科书制度的“程序”或“本质”，并对我国教科书制度建设提出建议。

（一）描述倾向的比较研究

1. 对教科书制度全过程的比较研究

^① 胡东芳：《谁来决定我们的课程——主要国家课程权力分配比较研究》[J]，《外国教育研究》，2005 (03)。

^② 李钟国：《韩国教学书出版——以教科学观与教科书出版现状为中心》[C]，第九届中韩出版学术年会，2007，北京。

^③ Montagnes, Ian (2000): *Textbook and Learning Materials, 1990-1999, Thematic Studies for World Education Forum, Education for All Assessment*. UNESCO, Paris.

^④ Chester E. Finn, Jr., Diane Ravitch (2004), *The Mad, Mad World of Textbook Adoption*, <http://www.edexcellence.net/institute/publication/publication>.

这类研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整合不同地区教科书制度基础上的比较研究。例如《美国中小学教科书概况》^①和《法国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制度》^②两文，在综合美、法各地的情况后，介绍了教材编写、审查、选用、出版等情况。《国外中小学教科书制度简介》^③介绍了美、日、英等几个代表性国家的教科书编写、出版、选用、供给等情况。另一种是以有代表性的州或县的教科书制度为载体，对相关国家的教科书制度进行介绍。例如《论德国的教科书管理》^④，在分析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州教科书许可条例》的基础上，介绍了教科书的概念，教科书的适用性，教科书的选择、审查程序，教科书许可、许可限制等。

2. 侧重于教科书制度某一环节的比较研究

毫无疑问，教科书制度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成为比较研究的对象。从目前的成果看，研究主要针对教科书的审定（认可）和选用环节。例如《德国中小学教科书的审批和选用制度——以黑森州为例》^⑤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教科书的审定制度》^⑥两文，介绍了教科书审批权、审批范围、审批程序、审批条件，以及教师选择教科书的程序、教科书的购买，学生使用教科书的基本原则、义务，教科书的更新等情况。《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教科书选用制度》^⑦，介绍了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地的教科书选用主体、选用程序等情况。

（二）评价倾向的比较研究

研究人员普遍认为，任何一种教科书制度都有优点和缺点，因此将教科书制度或教科书制度某一环节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进行利弊的比较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将教科书批准和采用制度分为国定制、审定制、选定制、认可制、自由制。不过，这些划分并无固定的类型，研究者常常根据不同的研究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对教科书制度进行划分。

李志涛等将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划分为自由制和国家制，认为自由制有利于调动社会、地方及学校编写教材的积极性，促进教科书多样化，但是难以保证普遍的教学要求，难以体现国家意志。国家制有利于国家意志的体现，有利于对

^① 郑旺全：《美国中小学教科书概况》[J]，《课程·教材·教法》，2004(03)。

^② 课程教材研究所赴法考察组：《法国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制度》[J]，《课程·教材·教法》，1992(08)。

^③ 北师大课程教材研究小组：《国外中小学教科书制度简介》[J]，《教育学报》，1991(03)。

^④ 晓力：《论德国的教科书管理》[J]，《外国教育资料》，2000(06)。

^⑤ 周丽华、胡劲松：《德国中小学教科书的审批和选用制度——以黑森州为例》[J]，《课程·教材·教法》，2002(11)。

^⑥ 宗桂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教科书的审定制度》[J]，《课程·教材·教法》，1992(09)。

^⑦ 康长运：《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教科书选用制度》[J]，《大学出版》，2001(03)。

教育教学质量做出统一要求,但是在编辑和使用中易造成垄断和官僚主义,难以适应多种需要。^①

孔凡哲认为,完全开放的选用制度适合学生的特点和学校的实际需要,但对教师职业素质和道德标准提出了较高要求。审定制或认可制都能提高教科书质量。^②齐树同将教科书供应制度分为赠送制、租借制、购买制三种类型,认为与购买制和赠送制相比,租借制既减轻了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又能够将国家的教育经费使用效率最大化;重复使用教科书,可使有效资源物尽其用;借此开展道德教育。与一次性使用教科书相比,借用教科书也存在一些不足:易诱发传染病;内容容易陈旧;不能书写;学生易产生抗拒感;丧失反复学习的机会。^③

(三)解释倾向的比较研究

为了更为深入地理解各国教科书制度,研究者对影响教科书制度的相关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希望以此揭示教科书制度的本质。目前,研究者已就教科书制度的性质达成共识,认为教科书政策是一种文化政策,也是政治、经济的政策。^④因此,对教科书制度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应该是多角度的。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我国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进行了比较研究。

1. 社会学视角

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课程是一种“法定文化”,与此相关的教科书制度,也绝对不是纯技术性的、价值中立的活动。从总体来看,这类研究的重点有三个,一是通过研究教材出版决策过程,外部市场的发行过程,教材的编写与审查,以及教师对教材的选择,分析课程如何体现某些大众文化或主流文化。二是研究统治阶级如何通过制定严密的教科书制度,进行社会统摄、驱动与社会控制。三是研究权利分配与教科书制度的关系。

目前,国内基于这一视角的研究多集中在教科书审定制度上。研究者在对比研究了苏联、美国、英国、德国、中国台湾等地的教科书审定制度后指出,教科书评审发生于课程进入实践活动之前,它对经过选择进入课程的知识做出判断,判断知识是否属于“合法的”范围。在教科书的评审中,国家(政府)出于利益与意志的考虑,成立具体的职权机构,选择具体的评审人员,规定具体的评审标准

^① 李志涛、商发明、杨妍梅、王婷,《教科书制度的比较研究与改革对策》[J],教育科学研究,2005(05)。

^② 孔凡哲:《基础教育教科书质量保障机制的国际比较及启示》[J],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04(06)。

^③ 齐树同:《从世界教科书供应制度之比较看教科书租借制》[J],教育科学研究,2005(11)。

^④ 方炳隆:《澳门地区教科书选用制度》[C],台北师范学院:《迈上课程新纪元(三):教科书制度研讨会资料集》,2000(05)。

与程序,评审机构和人员则依据国家或地区的教育目标,制定具体的评审细则,评判教科书的价值特性,进而做出地位分等。这些都说明了教科书评审的功能是社会的统摄和驱动,是社会控制重要组成部分。^① 研究所提出的问题为我国的课程、教材改革提供了一种社会学的理论支持。

这类研究还从权利分配的角度出发,研究课程制度、教师和学生评价制度对教科书制度的影响。例如,有研究指出,世界主要国家在与课程权利分配密切相关的三个维度——课程标准颁布机构、教科书的编审及教材的生产方式以及课程决策权的类型上,既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同时又表现出一定的共同性。^②

2. 经济学视角

“教科书不但具有文化特质,而且具有商品特质”,^③因此,教科书制度的研究要与相关的市场因素研究相联系。这类研究涉及教科书的出版、审定、选用、发行、使用等方面,焦点有两个,一是分析现存的市场相关因素对教科书制度建立、实施的影响,二是研究不同的教科书制度对出版业发展的影响。研究目的是,为建立能够持久提供充足、高质量教科书的教科书制度提供建议,并希望通过建立公平竞争的教科书制度促进出版业的发展,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

这类研究调查了非洲、欧洲、大洋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对教科书的资金投入情况及产生的效果,研究了高科技对出版业的影响,分析了当前出版业发展的国际倾向,^④提出发展中国家要利用好国际组织提供的资金和技术培训,为教科书本地化制定政策、提供设备,并用法律保证实行。^⑤

就出版制度而言,研究指出,开放的编写和出版制度,有利于形成一批高水平的、具有专业水准的教科书企业,促进教科书质量的真正提高。这种开放的编写和出版制度要有效发挥功能,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市场经济比较成熟、规范。第二,出版社具有相当的编写和出版教科书的专业经验。在教科书的使用制度方面,研究分析了各种使用类型对国家、个人的经济影响,以及对教科书质量的影响等。^⑥

^① 张行涛:《统摄、驱动与社会控制——教科书评审的社会学意义》[J],教育科学,1999(04)。

^② 胡东芳:《谁来决定我们的课程——主要国家课程权力分配比较研究》[J],外国教育研究,2005(03)。

^③ Pernille Askerud(2002):*A Frame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olicies For The Provis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Schools and Non-Formal Education Programmes*, UNESCO. 见:<http://www.uis.unesco.org>.

^④ 王跃:《国际教科书出版概况》[J],中国出版,1997(08)。

^⑤ 杨康陵:《法语国家在教科书出版活动中的联合行动》[J],编辑之友,1997(01)。

^⑥ 沈晓敏:《世界各国教科书制度对我国的启示》[J],全球教育展望,2001(09)。

3. 历史学视角

法国思想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指出:“各个体系都始终处在流变当中,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环节上,这些持续的变化都关系到……相关环节的社会条件,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同时摆脱恐新症的偏见和恋新症的偏见,智慧也就由此开始滋长。”“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将不再会陷入武断的过度简化,而会接受一种客观冷静的考察,全面展现它的复杂性。”^①教科书管理制度具有历史性,它的形式随着社会发展、教育自身发展而不断地动态地发展着。通过对教科书制度形成史的比较研究,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教科书制度与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认识到教科书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每一次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变革,必然带来教科书制度的变化,同时也促进了人们智慧的增长。

从历史学视角进行研究,通常要搜集大量的资料,在对资料进行分析后,划分教科书制度的发展阶段,并探讨在各个转折点上的重大历史事件。目前我国对此涉及较少,研究主要集中于日本的教科书制度发展史。例如,李英、张辉等学者认为,日本教科书的出版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自由出版时期(1868~1879年)。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鼓励发展翻译、出版事业,文部省对于翻译欧美的教科书不采取任何干涉措施。二是审定时期(1880~1902年)。明治中期以后,日本政府对全盘西化潮流进行反思和抵制,加强教科书的出版管理。三是国定期(1903年以后)。国定教科书制度的建立,与日本教科书出版发行竞争中发生的腐败事件密切相关。尽管文部省做出了对违法乱纪行为严厉处罚的规定,但在审查和选用教科书的过程中,行贿、受贿的丑闻屡见不鲜,而且愈演愈烈。1902年,日本在全国范围开始了大规模的检举揭发活动,挖出了一大批违法犯罪分子。以此为契机,日本建立了教科书国定制度。^②

(四)研究者提出的建议

学者们通过以上研究,对教科书制度进行探索,并对中国内地的教科书制度建设提出建议:

孔凡哲指出:①抓好课程、教科书开发与评价的制度建设。包括课程开发人员的专业化,研制开发系统与推广系统的局部分离,建立课程、教科书反馈机制、反馈系统。②开展相关的理论研究。包括:与新课程配套的课程评价、教科书评价的理论研究,课程评价的新领域——课程教科书保障理论研究,课程评价的实用模式研究,教科书评价信息的及时反馈模式研究。③借鉴国外经验,探索实践

^① 爱弥尔·涂尔干著,李康译,《教育思想的演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1页。

^② 李文英、张辉:《近代日本教科书的出版与启示》[J],中国编辑,2003(02)。